

皖北地区东汉抱鼓石祠堂研究

王传明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皖北地区淮北市和萧县发现的抱鼓石祠堂有着前室后龕的独特造型,通过前室后龕画像的配置情况可知,工匠并没有将祠堂构建为人间宅院的前堂与后室,而是前室的人间世界与后龕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前室的人间世界是祠主后人所能到达的最远之地,后龕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是祠主所升往和新生之地,并且可以乘坐车马来人间世界,享受其后人供奉的酒食与祭祀。这显现出建筑结构与画像所构建世界的割裂。祠主与其后人在前室人间世界的共存与发生关联明显有别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所表达的“长就幽冥则决绝,毕圻之后不复发”墓主与其后人的“决绝”关系。这些都为审视汉代地上祠堂与地下墓葬的建筑结构、画像配置和丧葬逻辑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新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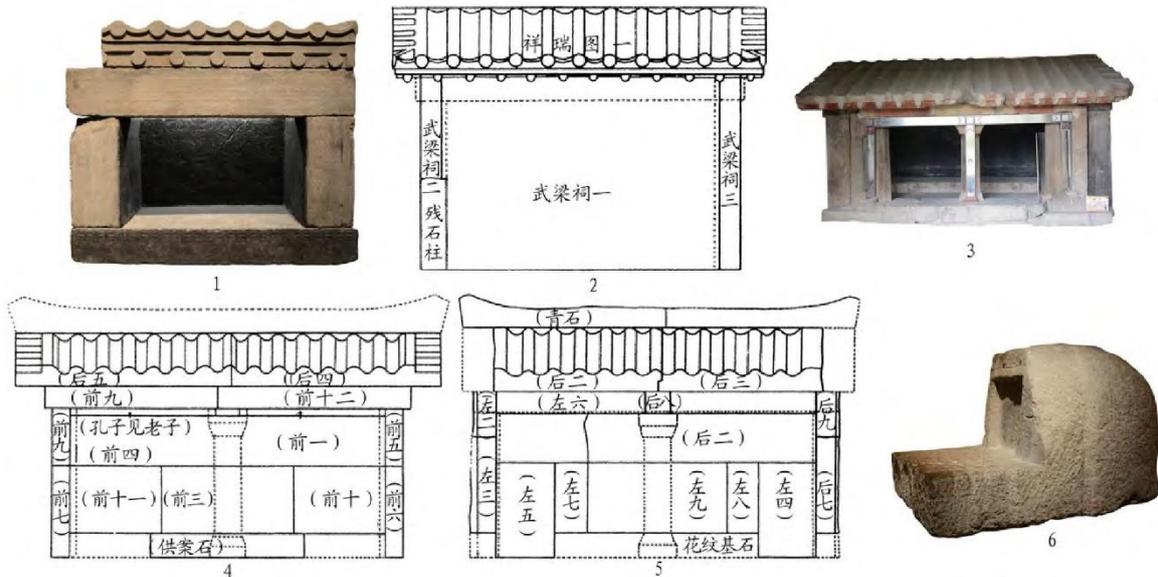
关键词: 汉代;皖北地区;抱鼓石祠堂;前室后龕;画像配置;丧葬逻辑;

近几年,《东南文化》连续刊发了皖北地区淮北市发现的保存在原地的3处四座抱鼓石祠堂的发掘报告^[1]。据这些发现可知,完整的抱鼓石祠堂由9块石构件组成,为前室盖顶石1、左右侧壁抱鼓石2、基石1、后龕盖顶石1、左右侧壁石2、后龕基石1和后壁石1。虽然此前在淮北市和萧县有着一些发现,但只为这类抱鼓石祠堂的散件,不能对祠堂整体的画像配置与内在逻辑形成全面且有效的认知。这四座祠堂的发现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笔者不揣浅陋,就抱鼓石祠堂特殊建筑结构下的画像配置、空间属性和丧葬逻辑等问题略抒浅见,敬请方家指正。

一、皖北地区东汉抱鼓石祠堂的独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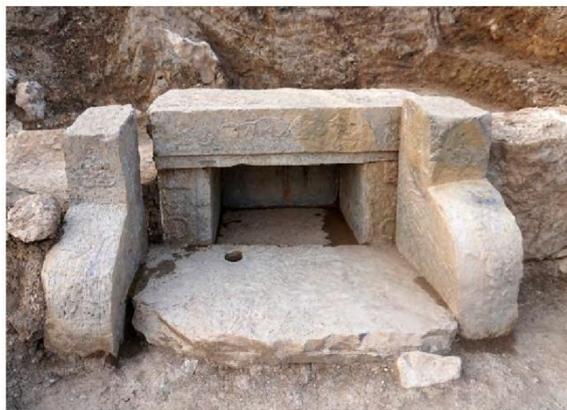
关于汉代石构祠堂的形制,信立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小型单开间平顶房屋式祠堂,以山东嘉祥宋山1号小石祠为例(图一:1);第二种为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祠堂,这种祠堂在山东、江苏和安徽地区都有发现,以山东嘉祥武梁祠为代表(图一:2);第三种是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祠堂,以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为代表(图一:3);第四种是后壁带有方形龕室的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祠堂,以嘉祥武氏祠前室和左右室为代表(图一:4、5)。此外,信立祥还引《水经注》所载汉荆州刺史李刚石祠为三开间。只是此石祠未被发现,亦无其他三开间的石祠发现,故不列出^[2]。蒋英炬和杨爱国所著《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一书对汉代石构祠堂形制的划分也用此说^[3]。除了这四种形制的祠堂,应该还存在一种将墓前祠堂和后部封土雕刻于一起的小祠堂,仅有一例,为山东临淄出土的东汉王阿命祠堂(图一:6)。关于这件刻石的性质,学界有着其为东汉造像等不同认知^[4],笔者赞同杨爱国、郑岩的观点^[5],为一小石祠。

将上述五种石构祠堂与抱鼓石祠堂进行比较,会发现抱鼓石祠堂的建筑结构和画像配置都有独特之处。首先,抱鼓石祠堂前室后龕的建筑结构形成了进深的层次感和结构空间;其次,前室顶部高于后龕,形成了错落的层次感;再次,其前室后龕的建筑结构使得画像配置不再如武梁祠一般,只有上下排列的“上天征兆”“神仙世界”和“人类历史”三个单元^[6],而是有了画像的前后布局;最后,抱鼓石祠堂有建筑上的三个立面和前室后龕两个空间,其中前室盖顶石和左右侧壁抱鼓石的正面形成祠堂的最外侧立面,后龕盖顶石和左右侧壁石的正面形成中间立面,后壁石正面为最内侧立面。而三个立面和两个空间的画像却将这座实体的祠堂区分为外侧的人间世界与内侧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神仙世界,显现出建筑结构与画像世界的割裂(图二)。下面,依次来观察这三个立面和两个空间的画像。



图一//五种不同形制的祠堂

1. 宋山祠堂（山东博物馆复原）2. 武梁祠复原图 3. 孝堂山石祠 4. 武氏祠前石室复原图 5. 武氏祠左石室复原图 6. 王阿命祠堂（图片 1、3、6 来源：笔者自摄；图片 2、4、5 来源：《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年，第 64、68、72 页）



图二//淮北洪山祠堂 C1

（图片来源：《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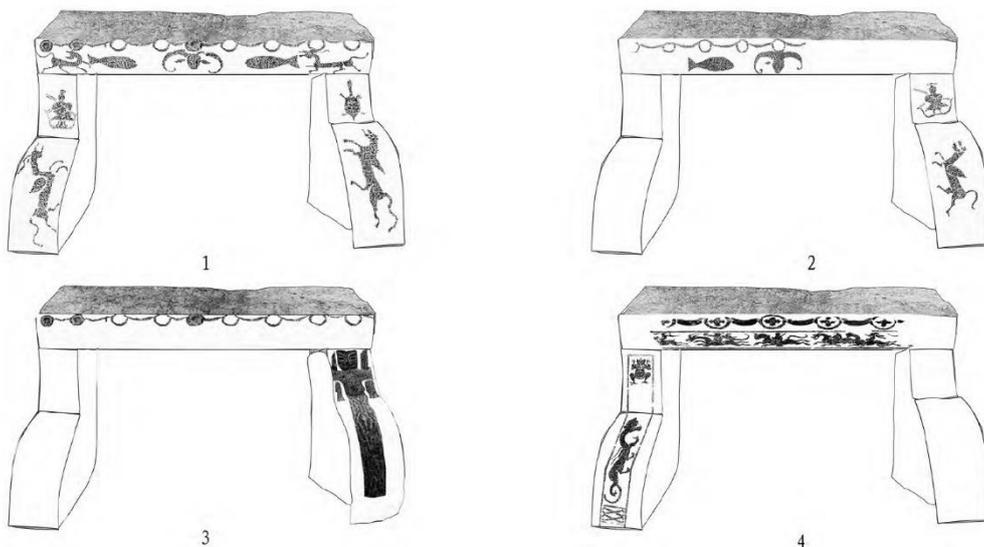
二、抱鼓石祠堂的三个立面

抱鼓石祠堂的建筑结构是相对开放式的，前后构件之间几无遮挡。这种开放性不只是针对祠主的子孙亲朋，还包括附近的乡邻、过路者及不相干之人。所以，才有山东东阿梦他君祠堂题记“唯观者诸君，愿勿败伤，寿得万年，家富昌”^[7]和嘉祥许安国祠堂题记“唯诸观者，深加哀怜，寿如金石，子孙万年。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宅，但观耳，无得刻画，令人寿，无

为贼，祸乱及孙子”^[8]之语。前述五种祠堂除了王阿命石祠外，其余四种祠堂的外壁几无画像，观者只有进入祠堂内部方可看到内壁和顶部的画像。由是，本文也遵从这种观看习惯，从外向内（从前向后）观察抱鼓石祠堂的三个立面。

（一）最外侧立面：前室盖顶石和前室左右侧壁抱鼓石正面

由三篇发掘报告可知，四座保存在原地的抱鼓石祠堂为淮北相山区洪山祠堂 C1、洪山祠堂 C2、烈山区邓山祠堂和相山“永元八年”祠堂。四座祠堂的构造和形制相同，但保存状况不尽相同。其中洪山祠堂 C1 保存较好，9 块祠堂构件均保存在原地；洪山祠堂 C2 早期遭到破坏，现存 5 石；邓山祠堂存 6 石；“永元八年”祠堂仅存 4 石。



图三//皖北地区四座抱鼓石祠堂外侧立面画像

1. 洪山祠堂 C1 2. 洪山祠堂 C2 3. 邓山祠堂 4. 相山“永元八年”祠堂（图片来源：笔者根据发掘报告绘制）

洪山祠堂 C1 的前室盖顶石正面的瓦垄和檐头下方正中雕刻一羊头，两旁各有一鱼，再旁各为一青龙和白虎；前室左侧壁抱鼓石正面刻一龟和白虎，右侧壁抱鼓石正面刻一蹶张与青龙。故洪山祠堂 C1 最外侧立面的画像组合为上：羊头、鱼、青龙、白虎+左：龟、白虎+右：蹶张、青龙（图三：1）。

洪山祠堂 C2 最外侧立面的画像组合为上：羊头、鱼+左：蹶张、白虎+右：/（图三：2）。

邓山祠堂最外侧立面的画像组合为上：/+左：力士+右：/（图三：3）。

相山“永元八年”祠堂最外侧立面的画像组合为上：一队羽人和神怪骑乘行列+左：/+右：神怪、白虎（图三：4）。

以上就是淮北市保存在原地的四座抱鼓石祠堂最外侧立面的画像配置状况。此外，《汉画总录》37 和 38 两卷收录了淮北出土的一些抱鼓石祠堂构件，其中淮北市南山汉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盖顶石瓦垄下方只雕刻菱形连环纹样（图四）^[9]。淮北市大唐电厂发现的一前室右侧壁抱鼓石的正面上部刻蹶张，下部刻一白虎（图五）^[10]。

为方便观察抱鼓石祠堂最外侧立面的画像组合状况，制表如下（表一）。由表一可知，淮北地区抱鼓石祠堂最外侧立面的画像配置还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为上部：以羊头为中心对称分布的鱼、青龙、白虎或羽人、神怪骑乘动物以行+左侧：上部的蹶张或力士（间有龟）和下部的白虎+右侧：上部的蹶张或力士和下部的青龙或白虎。虽然材料不多，但是可以看出抱鼓石祠堂左、右侧壁石下部的青龙、白虎并没有严格按照它们的方位属性配置，这值得注意。

（二）中间立面：后龕盖顶石和后龕左右侧壁石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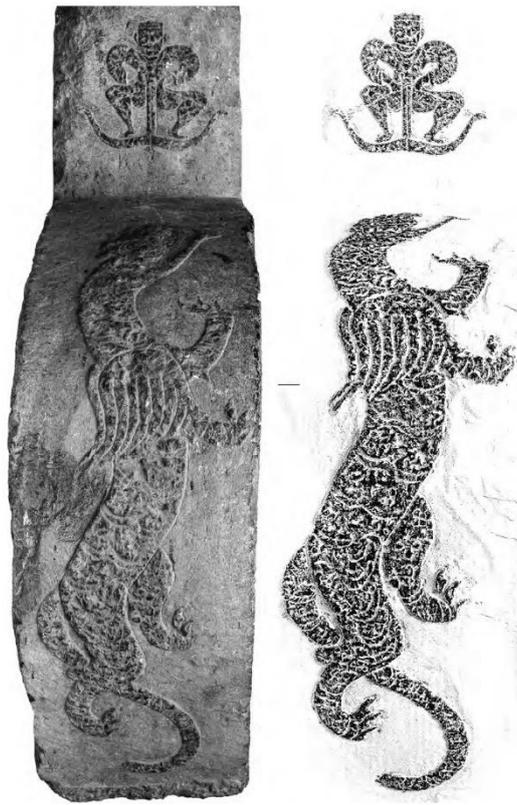
洪山祠堂 C1 后龕盖顶石正面刻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除了二位主神，还有羽人、九尾狐、三足乌、天马和捣药的二玉兔。左、右侧壁石对称地刻有水波纹、柿蒂纹和铺首衔环（图六：1）。



图四//淮北市南山汉文化博物馆藏盖顶石

表一//抱鼓石祠堂最外侧立面的画像组合

祠堂	最外侧立面画像		
	前室盖顶石	前室右侧壁抱鼓石	前室左侧壁抱鼓石
洪山祠堂 C1	羊头及其两旁的鱼、青龙、白虎	蹶张	龟
		青龙	白虎
洪山祠堂 C2	羊头及其两旁的鱼	/	蹶张
			白虎
邓山祠堂	/	/	力士
			菱形纹
“永元八年”祠堂	羽人和神怪骑乘动物以行	神怪	/
		白虎	
南山汉文化博物馆藏祠堂石	菱形连环纹	/	/
大唐电厂祠堂石	/	/	蹶张
			白虎



图五//大唐电厂右侧壁抱鼓石正面画像

洪山祠堂 C2 的后龕盖顶石正面也刻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画中物象与 C1 相同，只是位置略有不同。左右侧壁石均不存，故画像不可知（图六：2）。

邓山祠堂后龕盖顶石正面中间阴刻带状菱形纹，两端有多个圆圈，左端和右端的数量分别为 12 和 9；左侧壁石和右侧壁石正面均刻带状菱形纹（图六：3）。

相山“永元八年”祠堂后龕盖顶石和左右侧壁石均不存，故画像不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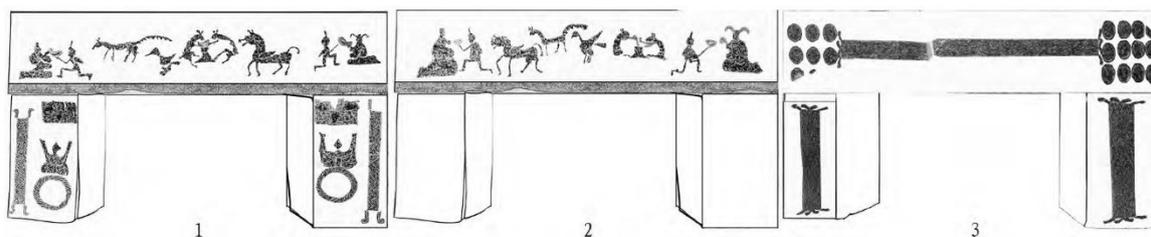
由上可知，这些抱鼓石祠堂后龕盖顶石和左右侧壁石正面组成的立面画像的配置情况有着繁简的差异，简单者如邓山祠堂只为简单的装饰纹样，而复杂者如洪山祠堂 C1 和 C2 则为上部：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左侧：铺首衔环和装饰纹样+右侧：铺首衔环和装饰纹样。造成这种繁简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工匠使用的“粉本”的差异，也可能是祠堂耗资差异造成的繁复与简化。

（三）最内侧立面：后龕后壁石正面

洪山祠堂 C1 后龕后壁石正面刻楼阁双阙宴饮图。楼阁顶部有一羽人戏二凤鸟，屋檐上有二猿猴，楼阁内有二人侧身对坐而饮，外侧檐下各有一正面端坐之人；楼阁下方有二女子侧身对饮，旁有一犬，楼梯旁有一人，手持肉串，旁有一人、一壶。双阙的顶部都有一鸟，上层悬有一弩，下层有一盾和戈（图七：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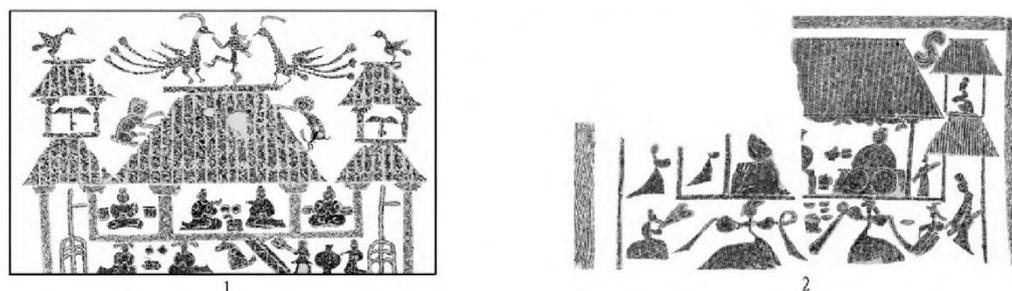
洪山祠堂 C2 后龕后壁石不存，故画像不可知。

邓山祠堂后龕后壁石残断为三块，余两块。其上刻厅堂双阙宴饮图。厅堂内有二人正面凭案踞坐，欣赏厅堂前方一鼓瑟者、一人吹竽者和二起舞女子的乐舞表演，厅堂外侧有一人佩剑、一人拱手而立。双阙的上层蹲立有一人，下层有一佩剑或拱手而立之人（图七：2）。从厅堂外侧和双阙下层佩剑或拱手而立之人的服饰来看，佩剑二人为男子，而拱手二人为女子。这种男女侍从分立两侧的配置暗示着厅堂内对饮二人的性别也有着男女之别。故佩剑侍者一侧为一男子，拱手侍女一侧为一女子。具体到他们的身份，则为墓主夫妇。因此，邓山祠堂后龕后壁上画像所描绘的是墓主夫妇对饮欣赏乐舞表演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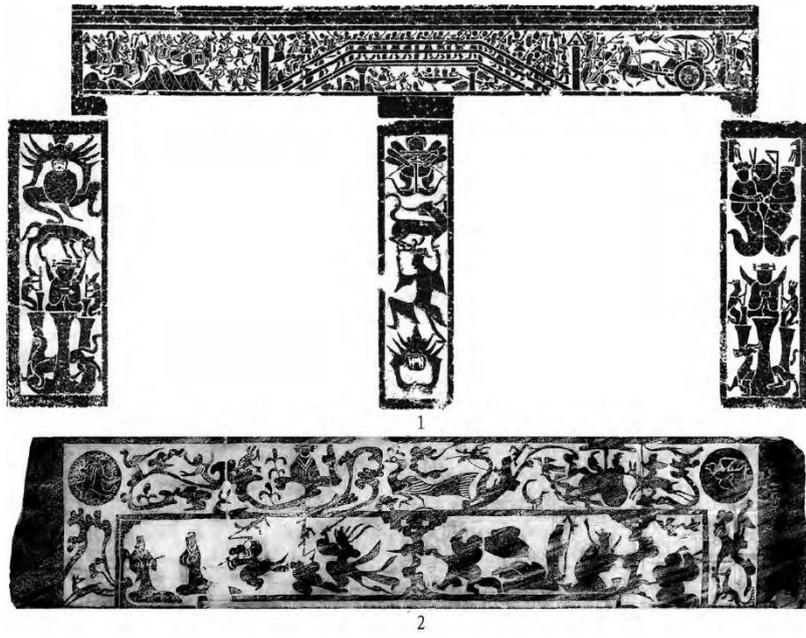
图六//洪山、邓山抱鼓石祠堂中间立面画像

1. 洪山祠堂 C1 2. 洪山祠堂 C2 3. 邓山祠堂（图片来源：笔者根据发掘报告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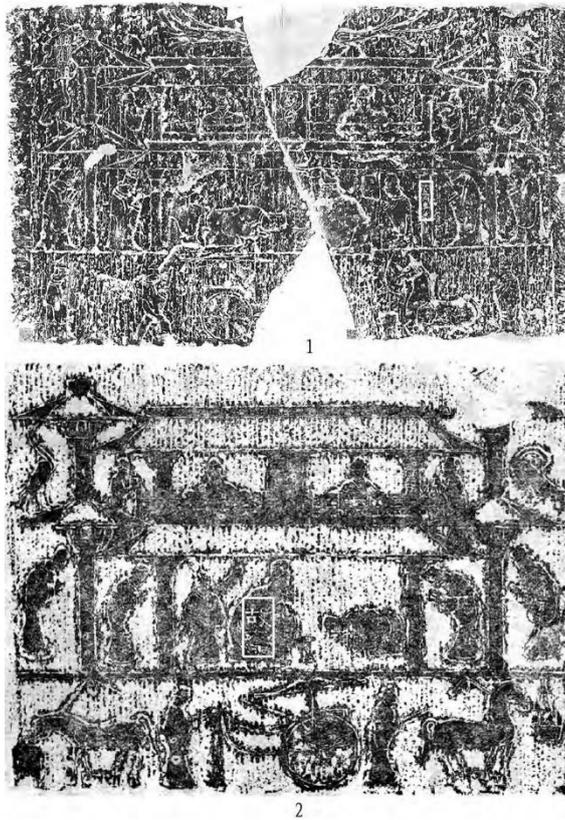
图七//洪山、邓山抱鼓石祠堂的内侧立面画像

1. 洪山祠堂 C1 2. 邓山祠堂 C1：5（图片 1 来源：《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图片 2 来源：《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邓山东汉早期画像石祠堂》）



图八//沂南北寨汉墓和神木大保当 M16 墓门画像

1. 北寨汉墓墓门 2. 神木大保当 M16 门楣（图片 1 来源：笔者根据发掘报告拼合）



图九//山东地区刻有祠主身份题记的祠堂后壁石

1. 嘉祥焦村出土 2. 嘉祥五老洼发现 (图片 1 来源:《山东汉画像石汇编》,第 163 页;图片 2 来源: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文物》1982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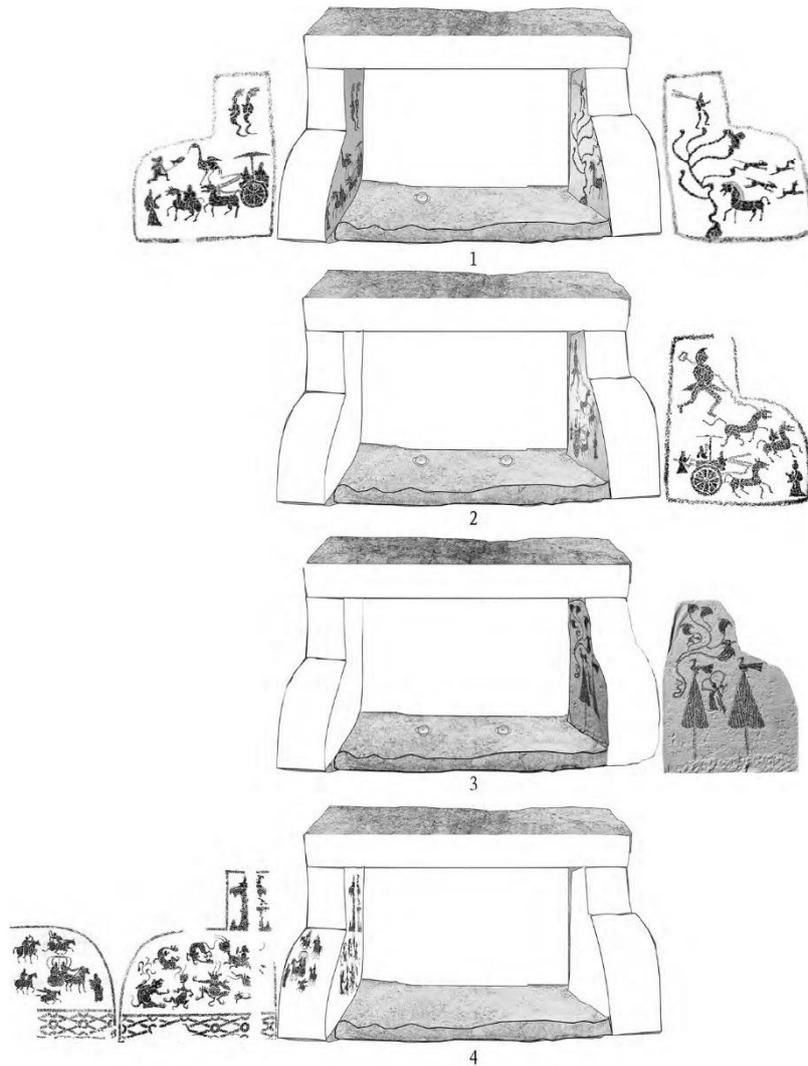
4、相山“永元八年”祠堂后龕后壁石不存,故画像不可知。

淮东北地区两座抱鼓石祠堂的后龕后壁石正面画像都为楼阁(厅堂)双阙宴饮图,宴饮的主角是楼阁或厅堂内的祠主夫妇,这也是整个宴饮场景的主画像。值得注意的是邓山祠堂的祠主夫妇为正面像。巫鸿将对称和正面构图的西王母、东王公称为“偶像型”^[11],依此来观邓山祠堂的祠主夫妇,他们似乎被偶像化。换句话说,他们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神格,而非人间普通的墓主夫妇。观察上述其他五种形制的祠堂后壁,会发现非常多的祠堂后壁主画像为楼阁拜谒图,画中的祠主为侧身像,接受他人的拜谒。这显现出邓山祠堂后龕后壁石正面墓主夫妇像的特殊。当然,虽然这种正面墓主像在东汉早期非常少见,但也并非孤例。如河南洛阳新安县铁塔山新莽壁画墓的后壁正中有一凭几正面端坐的高大男子,两旁跪有一持棒男子和一捧杯盘女子。该高大男子为墓主^[12]。也就是说,古人试图将墓主神格化的正面偶像式构图在新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如郑岩所言“东汉晚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墓中,大多数墓主画像演变为正面的形式”^[13]。

如此,抱鼓石祠堂的三个立面构成了前后演进的画像层次。最外侧立面前室盖顶石正中的羊头或羽人出行寓意此为吉祥之地,可以祭死者、佑后世。另,《论衡》有云:“觥觶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14]所以生双角的羊头是否也具有獬豸识别善恶的能力,以保护祠堂和祠主的周全,也值得思考。左、右侧壁抱鼓石正面下方对称分布的青龙、白虎则明确表达古人祛除邪祟的意愿,因为东汉时期的铜镜上有一类“青龙白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的铭文。

中间立面的带状菱形纹、水波纹、柿蒂纹和铺首衔环是后龕之门的装饰,铺首衔环既有分割和启闭门户之用,又有镇墓驱邪之意。而西王母和东王公以及其他神异动物都表明这门户之内便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西王母和东王公常见于信立祥所定义的四种祠堂的两侧山墙或墙壁最上层,不似抱鼓石祠堂这般具有界定其后空间属性的功能。有的画像石墓如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的左、右门柱石刻西王母和东王公,其功能与抱鼓石祠堂相同(图八:1)^[15]。陕西神木大保当 M16 墓门楣上层左侧刻端坐于云气之上的西王母,在她的对面有一仙人持节乘龙,后有一人御三飞鸟拉车以行,车上端坐有一人,最后为一仙人持旒骑鹿(图八:2)^[16]。该画像描绘的是墓主乘云气车进入西王母神仙世界的场面。洪山祠堂 C1 和 C2 后龕盖顶石正面虽无祠主的身影,但其上物象同样表明了后龕内是祠主升往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

最内侧立面的楼阁(厅堂)双阙宴饮画像也与其他形制祠堂后壁的楼阁拜谒图不同。关于楼阁拜谒图,巫鸿和信立祥分别作过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综合来看有清代冯云鹏、冯云鹗的“王侯宫室”说^[17],波西尔(S. W. Bushell)和黄明兰的“穆天子会见西王母图”说^[18],容庚和费慰梅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的“敬拜墓主”图说^[19],土居淑子的“礼拜天帝使者图”说^[20]和长广敏雄的“礼拜齐王图”说^[21],并且都得出了自己的认识。巫鸿认为楼阁中贵人的身份是君王,且地位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统治者,他是原庙中高祖画像为原型创作的皇权象征^[22]。而信立祥则根据嘉祥焦村出土祠堂后壁石所刻“楼阁拜谒图”中被拜谒者身后楼柱上的“此斋主也”题记(图九:1)和嘉祥五老洼发现的第三石上层所刻“楼阁拜谒图”中被拜谒者身上的“故太守”题记(图九:2),将这类图像推定为祠主受祭图^[23]。与常见的楼阁拜谒图进行对比,会发现洪山祠堂 C1 和邓山祠堂不见拜谒之人,只有祠主夫妇饮宴的场面。且邓山祠堂祠主夫妇的形象也不是楼阁拜谒图中的侧身像,而是正面像。这都显现出抱鼓石祠堂画像的独特。



图一〇//四座抱鼓石祠堂外侧空间画像

1. 洪山祠堂 C1 2. 洪山祠堂 C2 3. 邓山祠堂 4. 相山“永元八年”祠堂（图片来源：笔者根据发掘报告拼合）

三、抱鼓石祠堂的两个宇宙空间

工匠以石材构建了抱鼓石祠堂的前室和后龛两个建筑单元，同时在这两个建筑单元内以画像描画了外侧人间世界和内侧西王母、东王公的神仙世界两个宇宙空间。

（一）外侧空间：人间世界

抱鼓石祠堂前室侧壁抱鼓石的内侧和基石上面刻有画像，盖顶石素面无画像。

洪山祠堂 C1 的前室左侧壁上上部有一负甬之人，下部有一大树，树上有一猴，树下有一马，朝向内，旁有二犬逐二兔；右侧壁上上部有人首蛇身之人，可能为伏羲女娲，下部有羽人持鱼饲鹤和车马出行图；基石的右后方凿刻一耳杯（图一〇：1）。

洪山祠堂 C2 左侧壁有一负钺牵犬的高大人物，下部为车马出行图；右侧壁画像不可知；基石近后龕处凿刻二耳杯（图一〇：2）。

邓山祠堂左侧壁上部有一枝叶繁茂之树，树下有一人张弓射鸟，下部有二常青树，树上各立一鸟；右侧壁画像不可知；基石近后龕处凿刻二耳杯（图一〇：3）。

相山“永元八年”祠堂右侧壁的内外都刻有画像，其中内侧上部刻一神人端坐于高座之上，下有一三足乌，下部刻七异兽；外侧下部刻车马出行图；左侧壁画像不可知；基石素面无纹（图一〇：4）。

除了这四座祠堂外，安徽淮北市、萧县还发现有一些零散的抱鼓石祠堂前室侧壁石，有的可以确定属于同一祠堂。以下简要介绍。

前述大唐电厂右侧壁石的上部刻一神人端坐于高座之上，旁有一树、一人，下方有一九尾狐，下部刻狩猎图和车马出行图（图一一）^[24]。

杜集区石台镇程村出土的一对祠堂侧壁石，其左侧壁上上部刻二人持兵器相击，下部有二持槩戟和二持他物之人；右侧壁上上部有一衔蛇之人，下部刻三持物之人（图一二）^[25]。

程村出土的另一对侧壁石，其左侧壁的上部刻羽人、天马、鹿和云气纹，下部为车马出行图；右侧壁的上部刻一凤鸟，立于下部枝繁叶茂的大树之上，树枝间有五鸟，树下系一牛、一人张弓射鸟，旁有一常青树，上立一鸟，旁有五飞鸟，树下系一犬（图一三）^[26]。

程村出土的又一对侧壁石，其左侧壁上上部残，下部刻车马出行图；右侧壁上上部亦残，原刻有二人首蛇身之人，下部刻一兽身人面的神怪、二龙和一常青树，树上立一鸟，树下有一人（图一四）^[27]。

程村还发现有三左侧壁石，其一上部残，下部刻车马出行图（图一五：1）^[28]。另一上部、后部皆残，下部第一格刻一兽、一龙，第二格刻车马出行图（图一五：2）^[29]。再一上部、前部皆残，下部刻车马出行图（图一五：3）^[30]。



图一二//程村出土一对祠堂前室抱鼓石（1）

（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淮北》，第142—1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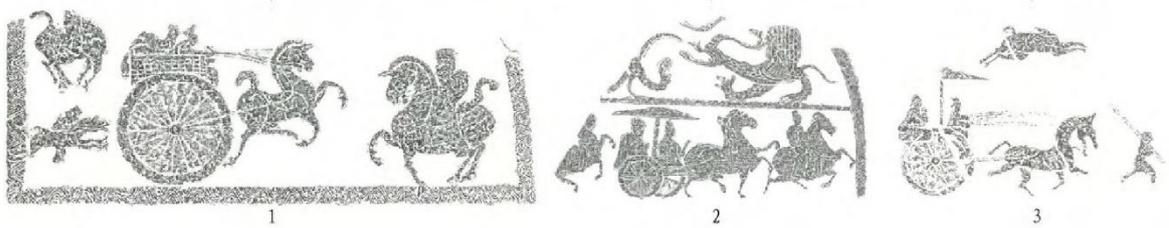
图一三//程村出土一对祠堂前室抱鼓石(2)

(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 淮北》, 第147—150页)



图一四//程村出土一对祠堂前室抱鼓石(3)

(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 淮北》, 第163—167页)



图一五//程村出土的三块左侧壁抱鼓石

(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 淮北》, 第140—141、158—159、168—169页)



图一六//白顶山村出土祠堂抱鼓石

1. 左侧壁石 2. 右侧壁石（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淮北》，第 156—157、174—175 页）



图一七梧桐村出土祠堂抱鼓石

（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淮北》，第 170、171 页）

白顶山村发现左、右侧壁石各一，但不属同一祠堂。左侧壁上、后部皆残，下部有一大树，枝上有一物，似为一鸟巢，树下系一马，旁立有一人（图一六：1）^[31]；右侧壁上部残，下部断为左右两块，刻狩猎图和车马出行图（图一六：2）^[32]。

梧桐村发现一左侧壁石，该石上部残，下部刻一树，树下系一马，旁有人持物或柱杖而立（图一七）^[33]。

徐州博物馆藏萧县征集的一对侧壁石，左侧壁刻一神人端坐于高座之上，旁有二人跪拜，下方有九尾狐和三足鸟，下部刻一大树，树下有一马，前方的树枝上挂一斗，马后有一人，持一物而立，似在捡马粪，上有一龙；右侧壁上部刻二人首蛇身人物，可能为伏羲女娲，下部刻车马出行图（图一八：1）^[34]。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一对侧壁石，左侧壁下部刻大树，树下系一马，一人持斗喂马；右侧壁上部刻一人凭案正面端坐，下部刻车马出行图（图一八：2）^[35]。另外，武利华的书中提到一座抱鼓石祠堂，其前室基石后端凿刻二耳杯，左右侧壁石画像据说为胡汉战争图，只是未给出图片；还提到宿州发现的一对前室侧壁石^[36]，但是画像的分层布局和内容实属怪异，疑为作伪之石，故不用。



图一八//徐州博物馆、汉画像石艺术馆藏祠堂抱鼓石

1. 徐州博物馆藏萧县征集 2.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图片 1 来源：李银德主编《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第 220 页；图片 2 来源：笔者拍摄）

表二//抱鼓石祠堂前室侧壁石内侧下部画像组合

祠堂抱鼓石	右侧抱鼓石画像	左侧抱鼓石画像
洪山祠堂 C1	车马出行	大树和马
洪山祠堂 C2		车马出行
邓山祠堂		常青树
“永元八年”祠堂	内侧下部:七异兽 外侧下部:车马出行	/
大唐电厂祠堂石	车马出行	/
程村祠堂(1)	三男子	四男子
程村祠堂(2)	大树、常青树	车马出行
程村祠堂(3)	常青树	车马出行
程村抱鼓石(1)	/	车马出行
程村抱鼓石(2)	/	车马出行
程村抱鼓石(3)	/	车马出行
白顶山村抱鼓石(1)	/	大树
白顶山村抱鼓石(2)	车马出行	/
梧桐村左侧壁抱鼓石	/	大树
徐州博物馆藏萧县征集的抱鼓石	车马出行	大树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抱鼓石	车马出行	大树

以上就是目前皖北地区所发现的前室侧壁抱鼓石，计 16 座祠堂的 22 石，其中左侧壁石 13 块，右侧壁石 9 块。整体来看，抱鼓石祠堂前室侧壁石上部的画像题材多样且不统一，下部则较统一，主要为车马出行图和大树或常青树。其中刻车马出行图者

12, 大树或常青树者 8 (表二)。据此可知, 车马出行图和大树或常青树是皖北地区抱鼓石祠堂前室最流行的画像组合。只不过它们并不固定在左或右侧壁石, 具有互换性。这显示出画像内容“格套化”和雕刻位置“可变性”的冲突性共存。另外, 大树或常青树下常系有一马(程村另一祠堂为一牛), 这些马除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抱鼓石的朝向外侧之外, 其余都是朝向祠堂内部的; 而车马出行图无一例外都是朝向前室外侧的。这构成一定的冲突性, 且这种冲突性显然是刻意营造的。关于此, 后面会作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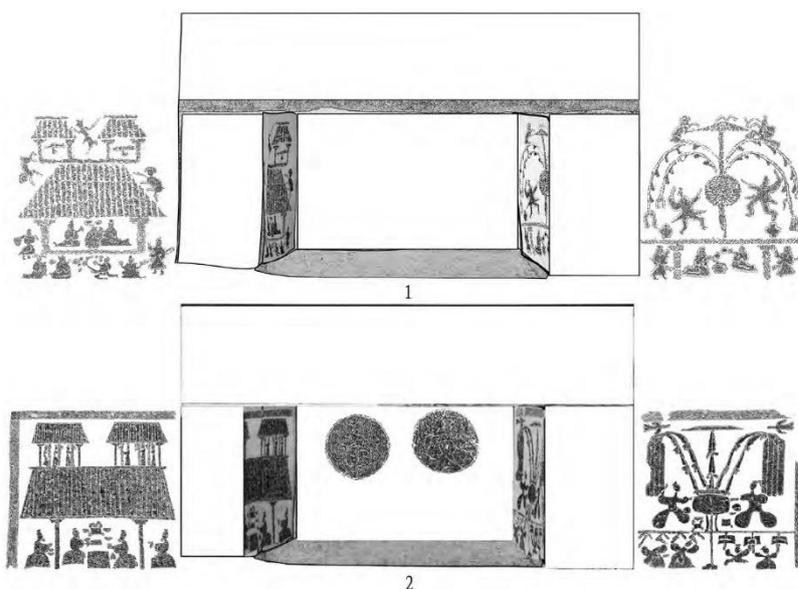
(二) 内侧空间: 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

抱鼓石祠堂中间立面的西王母、东王公画像昭示了后龕内宇宙空间为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 最内侧立面后方无建筑空间, 故其上画像与后龕左右侧壁和盖顶石画像一起描画了祠主在神仙世界的日常生活场景。

洪山祠堂 C1 后龕左侧壁石上格刻建鼓, 下格有二人对饮、二人佩剑而立; 右侧壁石刻楼阁六博和杂技图(图一九: 1)。

洪山祠堂 C2 后龕二侧壁石不存, 故画像不可知。

邓山祠堂后龕盖顶石刻日月之相; 左侧壁石刻建鼓奏乐图; 右侧壁石刻楼阁六博图(图一九: 2)。



图一九//洪山、邓山抱鼓石祠堂内侧空间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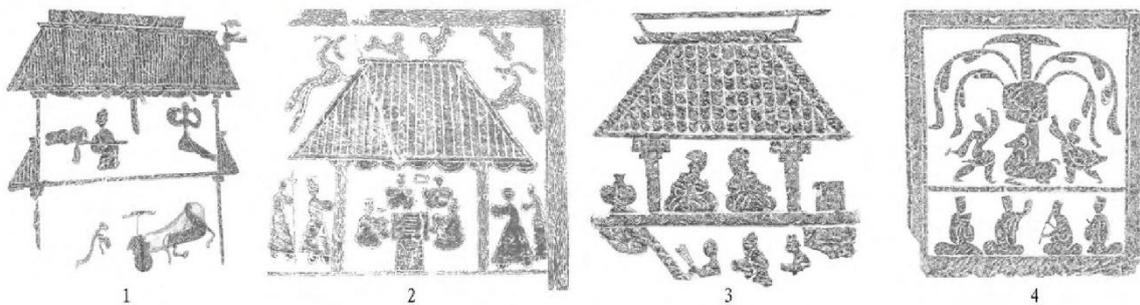
1. 洪山 2. 邓山 (图片来源: 笔者根据发掘报告拼合)

相山“永元八年”祠堂二侧壁石不存, 故画像不可知。

以上就是保存在原地的四座抱鼓石祠堂后龕左右侧壁石和盖顶石的画像配置情况, 可知为左壁: 建鼓+右壁: 楼阁六博图。除此之外, 淮北还发现有一些侧壁石, 如烈山区古饶镇杜庄村一石刻楼阁拜谒、梳妆和车马出行图(图二〇: 1)^[37]; 相山区瑞景凯旋城工地一石刻厅堂六博图(图二〇: 2)^[38]; 沟渠镇戏城村一石刻楼阁宴饮图(图二〇: 3)^[39]; 程村一石刻建鼓奏乐图(图二〇: 4)^[40]。可以复原的相山区原上海餐厅建设工地小祠堂, 其左侧壁刻建鼓奏乐图; 右侧壁刻楼阁对坐图; 盖顶石刻日月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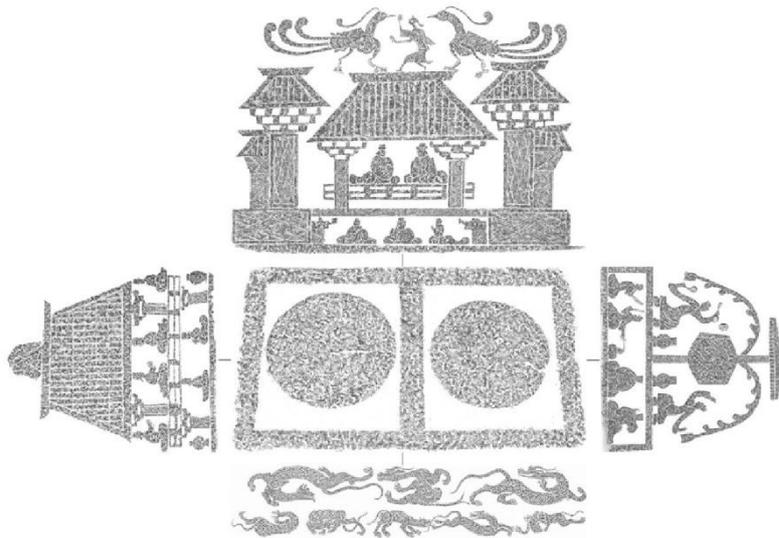
后壁石为双阙楼阁对坐图（图二一）^[41]。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一后壁石也刻双阙楼阁对坐图（图二二）^[42]。这些祠堂侧壁或后壁石未同出前室抱鼓石，故不能确定它们为抱鼓石祠堂构件。虽是如此，这些散石的画像题材也不脱抱鼓石祠堂后龛画像系统，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流行风尚。

要之，抱鼓石祠堂后龛内画像表现的以祠主现实生活为镜像的神仙世界的日常活动：夫妇宴饮、六博和欣赏鼓乐表演。前室的画像则较复杂，大树或常青树表现的人间世界的墓地，而车马出行图则为从仙界而来的祠主，到人间享受其后人供奉与祭祀。常青树正是墓地象征，因为虽有《礼纬含文嘉》“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43]之语，但从上述芈他君、许安国石祠题记“负土成墓，列植松柏”或“负土成坟，徐养凌柏”来看，常青树是为墓前所植的松柏。至于树下多系一马的大树，信立祥曾指出这些树木就是普通的树……图中所表现的场景就是墓地，树木和楼阁双阙一样，都不过是墓地的象征物^[44]。笔者赞同此观点，抱鼓石祠堂前室内常青树和大树图像的共存或替换也说明它们的寓意是相同的，都是墓地的象征。墓地也是祠主后人送别祠主所能达到的最远之地，再往前就是祠主会升往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他们不得不下马停驻并送别和祭祀祠主。所以，祠主和他的后人在前室画像构建的人间世界发生关联。这明显有别于元嘉元年（151年）画像石墓题记“长就幽冥则决绝，毕圻之后不复发”^[45]和阳嘉二年（133年）镇墓文“生人得九，死人得五，生死异路，相去万里”^[46]描写的生者与墓主的诀别之态。古人对待祠主和墓主的不同心态反映出地上祠堂和地下墓室营建的丧葬逻辑的差异性。



图二〇//淮北发现的四块祠堂侧壁石

1. 烈山区古饶镇杜庄村一石刻楼阁拜谒、梳妆和车马出行图 2. 相山区瑞景凯旋城工地石刻厅堂六博图 3. 沟渠镇戏城村石刻楼阁宴饮图 4. 程村石刻建鼓奏乐图（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淮北》，第20、21页，第42、43页，第47、48页，第161、1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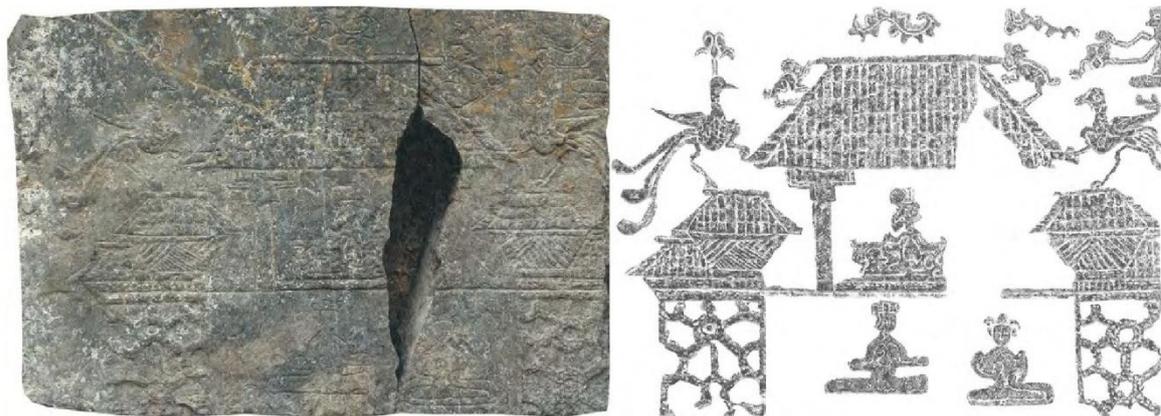
图二一//淮北相山区原上海餐厅建设工地小祠堂

(图片来源: 笔者根据《汉画总录·37, 淮北》, 第94—111页图片拼合)

四、抱鼓石祠堂画像配置的丧葬逻辑

当祠主后人站立或跪拜于祠堂前方的时候, 他们最先看到的是整座祠堂以及最外侧立面画像。它们提醒着祠主后人以及其他观者, 这是一座为祠主修建的祠堂。立面画像守护着祠堂门户, 昭示此为吉祥之地。

向内, 是人间世界。如前所述, 前室常青树和大树象征着墓地, 祠主后人到此下马送别或祭祀祠主。关于此, 信立祥提及日本学者藏田信吉在长清孝堂山下发掘出一座小石祠堂, 其后壁下层刻一幅祠堂祭祀图。画面左半部为一座土木结构祠堂建筑, 门前跪拜有一人和一钵、一灯, 其身后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树下有一侍从正在喂马, 表示祭祀者是骑马而来(图二三)^[47]。雕有耳杯的基石象征的是供奉和祭祀祠主的祭台, 石刻耳杯表达着为祠主提供永续不竭的酒食之物的美好祈愿。车马行列中的人与马均无神异色彩, 但其上部端坐于高座上的神人、九尾狐、人首蛇身之人、羽人、天马都昭示着他们是从仙界而来的祠主行列。祠堂为祠主而建, 画像所描绘的自然也是祠主亡故升仙之后的活动。关于死后升仙, 汉晋文献多有所载。如太史公有云: “自齐威、宣之时, 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 及秦帝而齐人奏之, 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羨门高最后皆燕人, 为方仙道, 形解销化, 依于鬼神之事。”^[48]又如汉武帝时期方士李少君的故事中, 武帝对少君之死的反应“居久之, 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49]。再如道教的观点“重生者独得道人, 死而复生, 尸解者耳”^[50]和“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51]。这都表明汉晋时期死后尸解成仙信仰的流行, 抱鼓石祠堂画像有此设计也就不难理解了。



图二//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一祠堂后壁石

(图片来源:《汉画总录·37, 淮北》, 第 218、2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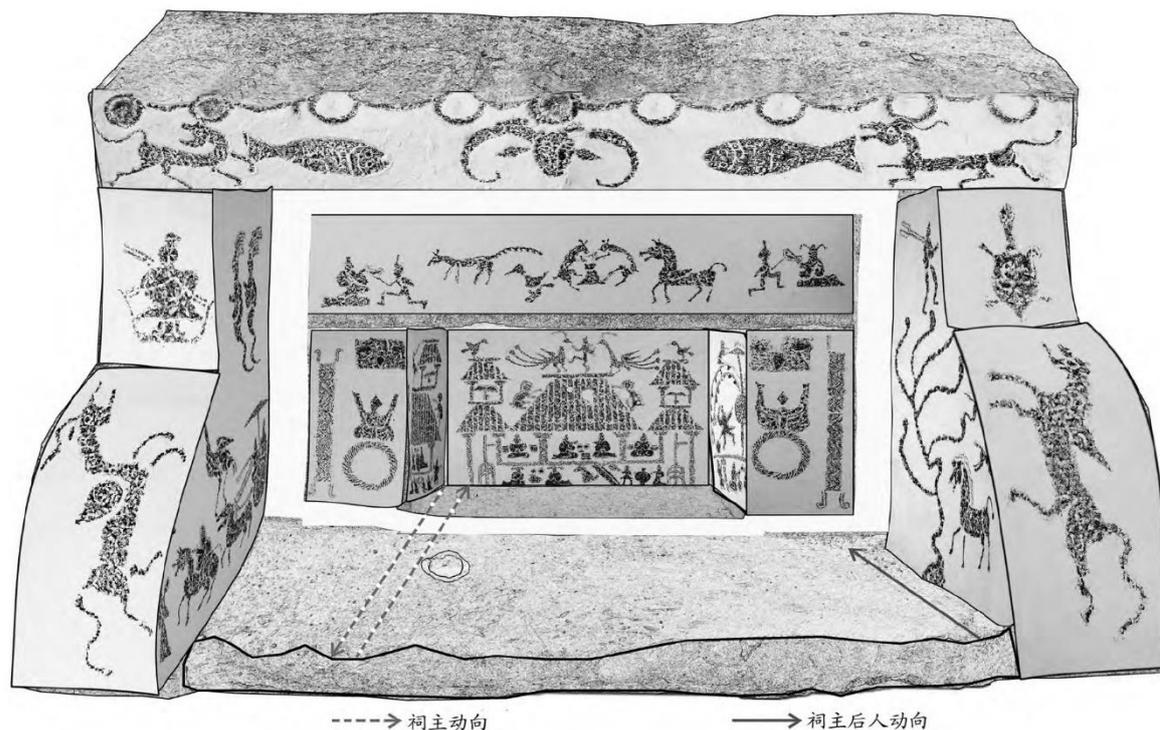
图二三//藏田信吉发掘小石祠堂后壁画像(局部)



图二四//巫山出土的两件鎏金铜牌饰

1. 巫山江东嘴小沟子出土 2. 巫山土城坡南东井坎出土

再向内，是进入西王母和东王公神仙世界的门户。中间立面画像将实体的后龛之门转化为进入西王母和东王公神仙世界之门。祠主通过此门，便可升入仙界成为仙人。重庆巫山发现的一类鎏金铜牌饰的中心为一圆璧，上方有“天门”榜题，下方端坐一肩生羽翼之人。最为特殊的是巫山土城坡南东井坎出土一件中间有横栏的铜牌饰，铜牌的中心没有圆璧，但是横栏下方的双阙间有“天门”榜题，下方同样端坐一肩生羽翼之人，而横栏上方为端坐于龙虎座头戴胜的西王母（图二四）^[52]。据此可知，川渝地区称西王母神仙世界的门户为“天门”。此处或也可称为“天门”。天门之后，就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了。



图二五//洪山祠堂 C1 所示祠主与其后人动向的差异与交叠

(图片来源: 笔者根据发掘报告改绘)

最内,即为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其他五种形制的祠堂都没有前堂后室的建筑形态,所以也就没有对应的画像。而抱鼓石祠堂虽有前室后龛的建筑造型,画像描画的却是与建筑形态割裂的人间和神仙世界。但是,这种建筑构造还是在抱鼓石祠堂留下了印记。工匠在后龛之内用画像构建了祠主在仙界的一座前堂后室布局的宅院:侧壁画像为祠主在前堂开放空间的宴饮宾客、与之六博、对谈及欣赏鼓乐表演,后壁画像为祠主夫妇在后室私密空间进行的对饮和欣赏乐舞表演活动,盖顶石上的日、月则为这座宅院提供着光明与温暖。不仅如此,祠主还从仙界的宅院出来,乘坐车马来人间享受后人的供奉和祭祀(图二五)。

所以,一座祠堂,两方世界,既为祠主而建,又指涉他的后人。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永元八年”祠堂题记“永元八年十月,癸卯朔十三日乙卯,都乡平基里孝子渡(度)大公,三口,六年十二月五日终,七年三月九日葬,大公身独无弟兄,思慕惟无用报父母恩,慕使石工相蒋石子、矐高次等十五人采石垒冢、为食室,功劳费用凡值钱三十二万三千,传告后子孙毋得坏败,口以报慈父之厚恩。后世贪财不顾义,欲坏真(塚),皆天所覆、地所不载,宜思利害。时太岁在丙申谷旦五十。此内刻画口上下口口口皆食大仓”^[53]。这应是抱鼓石祠堂画像配置与丧葬逻辑的最好注解。

五、结语

皖北地区的淮北市和萧县在东汉时期流行一种小型的抱鼓石祠堂,其前室后龛的建筑形态有别于其他五种形制的墓上祠堂。淮北四座保存在原地的抱鼓石祠堂,为探讨它们独特的建筑结构、画像组合和丧葬逻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新材料。从建筑结构来看,其前室后龛的结构形成了三个立面和两个建筑空间。从画像配置来看,三个立面的画像界定了内外两个宇宙空间:外侧的人间世界与内侧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人间世界描画了祠主后人到墓地祭祀祠主和祠主从仙界来到人间享受供奉之物的场面;仙界描绘了祠主在仙界的日常生活状态。这些画像有祠主和祠主后人两条主线,它们在前室交叠,让祠主与祠主后人同

时空共存且发生关联。

当祠主后人到祠堂祭祀祠主时，他们会对整座祠堂和最外立面辟除不祥及昭示吉祥的物象感到欣慰，会对前室基石永不朽坏的石刻耳杯提供永续不竭的酒食之物以飨祠主感到满意，也会对祠主在神仙世界的生活状态和来到人间世界享受供奉和祭祀感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祠堂的体量都非常小，很明显人是无法进入的。不过，当祠主后人俯身把酒食之物摆放于前室基石之上以祭祀祠主时，祠堂的画像还是可以被看到的。诚如芑他君祠堂题记“堂虽小，经日甚久……财立小堂，示有子道”和“起立石祠堂，冀二亲魂零有所依止”的表述，祠主及其后人的需求与表达都得到彰显，这正是东汉时期生死观念、神仙信仰、对孝的推崇与厚葬之风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 a. 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b. 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邓山东汉早期画像石祠堂》，《东南文化》2020年第6期；c. 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发现“永元八年”汉代画像石祠堂》，《东南文化》2021年第4期。

[2]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75-80页。

[3] 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6-94页。

[4] a. 临淄文物志编辑组：《临淄文物志》，中国友谊出版社1990年，第98、99页；b. 韩伟东、刘学连：《临淄石刻撷萃》，《书法丛刊》2007年第6期。

[5] a. 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65页；b. 郑岩：《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6] [美]巫鸿著，柳杨、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1-236页。

[7] a. 罗福颐：《芑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b. 陈直：《汉芑他君石祠堂题字通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8] 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9] 杨建华、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38，淮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8、219页。

[10] 朱永德、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37，淮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4、55页。

[11] 同[6]，第149页。

[1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新安县铁塔山汉墓发掘报告》，《文物》2002年第5期。

[13] 郑岩：《墓主画像研究》，《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8-194页。

-
- [14] 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七《是应篇》，载《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760 页。
- [15] 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 1956 年，第 12、13 页。
-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第 73、74 页。
- [17] 冯云鹏、冯云鹤：《金石索》，《续修四库全书》第 89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393 页。
- [18] a. [英]波西尔著、戴岳译：《中国美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年，第 21、22 页；b. 黄明兰：《“穆天子会见西王母”汉画像石考释》，《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
- [19] a. 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上册），北平考古学社 1936 年，第 24 页；b. 费慰梅著、王世襄译：《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中国营造学社 1945 年。
- [20] [日]土居淑子：《古代中国の画像石》，同朋社出版 1986 年，第 103-111 页。
- [21] [日]长广敏雄：《武氏祠左石室第九石の画像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版第 31 册。
- [22] 同[6]，第 208-226 页。
- [23] 同[2]，第 83-102 页。
- [24] 同[10]，第 49、51 页。
- [25] 同[10]，第 142-145 页。
- [26] 同[10]，第 146-151 页。
- [27] 同[10]，第 163-167 页。
- [28] 同[10]，第 140、141 页。
- [29] 同[10]，第 158、159 页。
- [30] 同[10]，第 168、169 页。
- [31] 同[10]，第 156、157 页。
- [32] 同[10]，第 174、175 页。
- [33] 同[10]，第 170、171 页。
- [34] 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7 年，第 65、66 页。

-
- [35] 同[34], 第 65、66 页。
- [36] 同[34], 第 63、64 页。
- [37] 同[10], 第 20、21 页。
- [38] 同[10], 第 42、43 页。
- [39] 同[10], 第 46-48 页。
- [40] 同[10], 第 160-164 页。
- [41] 同[10], 第 94-111 页。
- [42] 同[10], 第 218、219 页。
- [43] 魏·宋均:《礼纬含文嘉》,载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2045 页。
- [44] 同[2], 第 83-102 页。
- [45] 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 年第 2 期。
- [46] 嵇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1 期。
- [47] 同[2], 第 83-102 页。
- [48]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368、1369 页。
- [49] 同[48], 第 1386 页。
- [50]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 1960 年,第 298 页。
- [5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论仙》,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20 页。
- [52]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 年第 12 期。
- [53] 同[1]c。